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编

**Figures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民国人物
与
民国政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编

**Figures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民国人物与
民国政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5097 - 0994 - 8

I. 民… II. 中… III. ①历史人物 - 人物研究 - 中国 - 民国 - 文集 ②政治 - 中国 - 民国 - 文集 IV. K820.6 - 53
D69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8869 号

序

所谓学问，仅就字面而言，当有学有问。有学无问，缺少必要的质疑与切磋，能否成就真学问，是很可疑的。即使曾经是真学问，长久地学而不问，也会因故步自封而走向僵化，终将渐渐失去鲜活的生命力。这学术之问，既包括自己之问，同事之问，还应当包括海内外的同行之问。问之愈广，学之愈真愈深。切磋学问的途径固有多种，而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是中国近代史的专业研究机构，聚集了一支高水准的也是海内外最大规模的专注近代史研究的队伍。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则是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学术机构和智库。尤其是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来说，胡佛研究院档案馆关于民国时期珍贵史料的收藏，是一座令人向往的宝藏，前往探宝者络绎不绝。近代史研究所和胡佛研究院的学术合作无疑将对近代史的研究产生推动作用。

早在五年前，近代史研究所和胡佛研究院便已开始探讨合作的途径。最初的商讨是围绕着学术资料的保存及开发而展开的，碍于一些我们不能左右的因素，尚未成功。2008年11月，双方共同主办了“民国人物与民国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合作终于迈开了重大的一步。这本论文集便是此一会议的成果体现。

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必有几位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人物，他们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给这个时代打上了深刻的个人印记。蒋介石便是其中极为关键的一位人物。这次讨论会充分利用胡佛档案馆所藏史料，对民国人物，主

要是蒋介石，进行了集中的研讨。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各自观察角度的不同，海内外学者对于蒋介石的认知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在不同地域，蒋介石分别呈现出神与恶魔的不同面相。随着岁月的流逝与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以更为科学的冷静的目光来审视过往的历史人物，蒋介石走下了神坛，也走出了地狱。研究者终于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展开平实的对话。作为长时期统治中国的领袖人物，蒋介石在争取国家统一、维护国家主权及促进中国现代化发展方面，有成有败。是非功过，如何评说，给研究者留下了巨大的研究空间。

为民国史研究的发展提供机遇的不仅是研究环境的改善，相关史料的进一步开放也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可能。这其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暂存在胡佛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对社会的开放。长达五十五年的日记，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使我们对许多历史事件的了解更为准确。本书收录论文 17 篇，这些论文在若干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民国史研究的新方向、新动力。可以预料，《蒋介石日记》对民国史研究的冲击和推动还将进一步展现出来。

召开“民国人物与民国历史”讨论会及编辑出版这一论文集是近代史研究所与胡佛研究院成功合作的开端。双方同意，这一联合研究及召开研讨会的方式将继续进行下去。此外，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也将进一步扩大。我们期待着，这一合作的加强将为海内外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不断提供新的助力。

胡佛研究院的布雷迪、郭岱君、林孝庭及宋曹琍璇先生，近代史研究所的金以林先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杨群和徐思彦先生以及诸多同仁，为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及论文集的顺利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王建朗

2009 年 8 月

目 录

序	王建朗 (1)
---------	---------

民国初年国民党民族政治之

再思考 (1911 ~ 1928)	林孝庭 (1)
1923 年蒋介石访问苏联	山田辰雄 (22)
关于 1927 年南京事件的几个问题	陈谦平 丁兆东 (42)
蒋介石与 1935 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	鹿锡俊 (88)
走向“团结”	
——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的蒋介石与西南	罗 敏 (133)

“忍气吞声，负重致远”：从蒋介石

日记看他对雅尔塔协议的态度	郑会欣 (170)
蒋介石战时外交：谈判策略与内外互动	戴鸿超 (194)
信任的流失：从蒋介石日记看	
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	王建朗 (212)
试论戴笠在国民党内的人际关系	马振犊 (236)
蒋介石与 1945 年昆明事变	汪朝光 (251)
蒋介石与基督教	

——日记里的宗教生活	裴京汉 (277)
------------------	-----------

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

——蒋介石日记解读 杨天石 (290)

二二八事件与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经济改革

(1945 ~ 1949) 郭岱君 (314)

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与北塔山事件 吉田丰子 (322)

关于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问题

——以 1949 年蒋介石下野及其对北平和谈的

影响为例 杨奎松 (350)

再论日本产经新闻之蒋介石秘录的史料价值

——与蒋介石日记之比较 川岛真 (380)

胡佛研究院藏宋子文档案概况及其学术价值 吴景平 (393)

民国初年国民党民族政治之再思考

(1911 ~ 1928)

◇林孝庭*

一 革命党人早期的民族政治观

长期以来，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颠覆了清朝统治，缔造了中华民国。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政治现实是，孙与他所领导的革命党人士，在随后民国初年的政坛上，从未能够真正掌握民国的中央政权。1912年1月，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在政治现实上，仍与北方实力派的袁世凯对峙。袁世凯凭借着军事实力，逼迫清皇室退位，统帅北洋新军，并取得外国主要势力的支持，也让他成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军政强人。^① 因此两个多月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民国首都也从南京迁往北京。据此可以说，孙中山本人并未能够成为民国名副其实的最高领袖，而其所领导的革命党人，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无从应对晚清以来中国复杂的民族政治与边疆少数民族领土问题。反之，袁世凯上任后，以他为首的北洋政府，才是责任的承担者。而如何将前清边疆藩属领土，转化为新民国“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成了北京民国政府无从推却的政治使命。

*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

① Ernest Young,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 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pp. 52 - 59.

民国肇建以后，尽管革命党人的政治实力未展，但他们对于民初中国边疆形势的关注，并未有所减少。事实上，在辛亥革命之前，其政治宣传，即是以推翻清朝统治为首要目标。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反满”情绪，同盟会及其前身兴中会，都曾打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然而这一革命运动的酝酿时期，不同的革命党人士也曾试图宣扬，一旦推翻清朝后，汉族应与其他各少数民族和谐共处，只不过此一看法并未在革命党人中获得全然的赞同。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革命党人士之间，对于如何处理此一问题，未曾有过一致的看法。譬如说，汪精卫曾力主建立一个由汉人完全当家做主的民国政权，他认为，一旦满人被推翻后，终将归顺于广大汉族，届时其他各少数民族也终将为汉文化所同化。然而他的看法并不完全被其他革命党人士所接受，如刘揆一，尽管他认同新民国的政权应归属汉人，但他同时也认为，只有中国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安靖，汉族的新民国政权才有稳定可言。因此，刘揆一力主同盟会应致力于在满、蒙、回、藏各族中，广泛吸纳新人才，扩充革命队伍。他还提倡汉人应积极拉拢身边的少数民族革命党人，把他们当作革命事业的潜在盟友，联合起来推翻清朝统治。^①

辛亥革命后，清朝统治垮台，中国近五千年来的帝国秩序亦随之崩解。此刻，革命党人很快地提出了“五族共和”构想，这“五族”指汉、满、蒙、回与藏族。该理论一方面暗含了国民党人的前提预设，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秩序建构。在他们看来，满族皇室退位后，原清帝国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事实上并非真正想脱离新民国而谋求独立，他们仍希望有一个新的中央统一领导，获取与汉民族同等的地位。^② 革命党人似乎还一

① 杨天石：《从“排满革命”到“联满革命”》，《民国掌故》，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第19～21页。

② 《革命文献》第69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1976，第25～26页；另见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1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1996，第199～260页。

厢情愿地认为，一旦他们取得新的民国政权，就可以重新确立以汉族为中心的边疆民族政治新秩序。正因为如此，1912年8月间，当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国民党之后，“厉行种族同化”成为其积极强调的政治宣传。

民国肇建后，袁世凯凭实力取得政权，在野的国民党人士，曾多次对当时中国边政危局，公开发表高调净言。他们普遍认为，袁世凯的北洋新政府，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来处理与面对极为复杂的边疆历史问题。当时的外蒙古危机，即是一例。1911年12月，外蒙古的王公贵族上层人士，趁中国内地革命形势混乱，宣布独立，奉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八世为大汗（元首），并宣称不再效忠新的民国共和政权。不仅如此，外蒙上层人士还逐出当地的清军官吏，大量驱赶杀戮晚清移民到此地的汉人。^① 1912年11月3日，库伦方面和沙俄进一步签订了《俄蒙协约》，沙俄承认外蒙的“自治”地位，并协助外蒙古编练军队；外蒙方面也向沙俄允诺相应的经济贸易特权。这项条约，本质上排除了新的中华民国政府对外蒙的统治权。^②

《俄蒙协约》的签署，一度令国民党人士群情激愤。1912年的12月，当时年仅26岁、仍在上海新军里担任团长的蒋介石，即曾发表文章，指出若欲平定北疆，唯有依赖军事武力。对于离心倾向日益明显的外蒙，蒋介石力主北京政府应立即发兵库伦，以维护中国在外蒙的主权。他还向袁世凯当局建言，中国政府必须清醒地看到，外蒙危机的幕后主使者是沙俄帝国主义。当时蒋介石并无把握中国能打败沙俄，但是他从军事专业的视角，在所发表的文章里提出了一份极为详细的军事计划。蒋指出，一旦外蒙局势稳定，中国应在蒙古库伦、新疆北部以及满蒙边界，布置一支

① C. R. Bawden, *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89), pp. 187-190.

② Baabar (B. Batbayar), *Twentieth Century Mongolia* (Cambridge: The White Horse Press, 1999), pp. 148-154.

20 万人左右的军队，以加强对俄的军备。^①

蒋介石的挚友、极为活跃的国民党理论家戴传贤，当时也主张对中国的边疆问题主动出击。1912 年 11 月，戴传贤在《民权报》上撰文，称国民党是全中国唯一敢于呼吁以军事手段来解决外蒙危机的政党，他还痛斥袁政府和其他政党，在北部边疆问题上的逃避态度，并强烈呼吁中国内地的汉族同胞，与“背信弃义”、“顽固不化”的蒙古族做一殊死战。同年 12 月，戴传贤进一步鼓吹以激进方式保卫外蒙古领土，甚至号召国人节衣缩食，捐款给中央政府作为军费，藉以履行新民国百姓的“公民义务”。^②

而除了外蒙之外，中国西南边境的情势也同样引起蒋介石、戴传贤等民初革命人士的高度关注。1905 年前后，清廷为了挽回在西南地区日渐衰弱的影响力，颁行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其中包括：所有康区藏民均得服从中央驻藏大臣的指令；一切税收都须上缴中央朝廷；地方寺院传统税项优惠予以取消；所有康区藏民都必须遵守中国内地律法等等。同时，清政府还派遣川军入藏，作为推动这些改革的有力后盾。这些举措令十三世达赖喇嘛极为不满，1910 年，他逃往印度，置身英帝国的庇护之下，清政府随即宣布将其废黜。^③

辛亥革命爆发后，驻藏卫队发生骚动，形势逐渐失控。拉萨当局趁乱要求中央将所有入藏部队和驻藏官员撤出西藏。袁世凯上台后，立即联络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宣布恢复其名号和地位，并谴责清政府的鲁莽行径。但是，达赖喇嘛此刻已不愿相信中央政府的诚意，亦不愿接受汉族当局掌控西藏事务。同年秋天，绝大部

① 蒋介石：《征蒙作战刍议》，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 35，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1984，第 37～55 页。

② 戴季陶：《征蒙与拒俄》（1929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3 日）、《蒙事中之八面观》（1912 年 11 月 18 日），见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第 539～555 页。

③ Elliot Sperling, "The Chinese Venture in K'am," *The Tibet Journal*, 1: 2 (1976), pp. 10-36.

分中央政府的军队陆续撤出西藏，经由英属印度取道返回内地。^①由于英方坚持以调整汉藏关系作为正式承认民国新政府的前提，袁世凯迫于外交形势与压力，只好示弱。他同意西藏代表与中央政府代表，以同等身份出席1913年召开的印度西姆拉会议。^②

对于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政局的演变，在野的国民党人一片哗然。为了展现国民党人士的非凡魄力，孙中山和黄兴等人，频频抛出议题，诸如鼓励汉人前往边疆地区移民殖边等等。孙中山还大力提倡，应在全中国大兴铁路，他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弱大”国家，唯有积极开发边疆，才能获得发展。他的论述从侧面说明了国民党人当时的边疆策略，即将蒙、藏等少数民族居住生活的边陲，作为中国版图的基本组成部分，亦不失为与列强相抗衡的一剂良方。^③

在蒋介石看来，西藏有史以来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藏人拒绝中央政府军队留驻拉萨，对他来说，则是断然不能接受的，这无疑是在与国民党所提出的“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唱反调。1912年夏天，四川都督尹昌衡在西康重新整编军队，并夺回数个边境县份的控制权。面对此一形势，蒋介石立即发表文章，指出北京政府唯有支持尹昌衡继续进攻拉萨，才能为日后的中英谈判西藏问题获取有利的政治资本，也才有希望重新恢复对西藏的主权。^④戴传贤也认为，收复西藏不仅有助于确立北京当局在西藏的统治地位，而且可以加强西南边防，遏制英国从印度蚕食中国西南。除此之外，蒋介石和戴传贤都主张，袁世凯应在

① 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 - 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Hertfordshire, England: Roxford Books, 1989);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 - 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② 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 1904 - 191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6) .

③ 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金冲及：《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第230～244页；林家有：《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④ 蒋介石：《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5，第16～22页。

西南的军事行动获胜后，任命尹昌衡为中央政府驻藏代表，并在川滇藏交界地区，开发并建立一个戍卫区。^①

然而袁世凯的考虑，显然与蒋、戴等国民党人士不尽相同。为了尽快获取英国对民国新政府的外交承认，同时避免西南边区问题，给北京的新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与军事负担，袁世凯三令五申尹昌衡停止入藏，并且严禁川康当地驻军，不得与藏人发生任何冲突。结果，当时占上风的尹军，只得听命行事，滞留在康藏边境。北京政府这一命令，也遭到川滇等地方当局的强烈反对，他们和国民党人一样，都认为诉诸军事手段才是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途径。^②

二 民族主义与务实主义

民国肇建前后，国民党人士对于清帝国秩序崩解后的边疆领土，究竟作何考虑？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外学界总把国民党视为近代中国民族运动的先驱者，为维护帝国瓦解后新民国的边疆领土与外交主权完整而不懈奋斗，甚少怀疑其在中国边疆领土问题上的革命与民族主义立场。然而，对于国民党人士是否真持此一立场的质疑，事实上早在民国肇建之初即已存在。君主立宪派领袖康有为，便曾与革命党人士针锋相对。1912年夏，康有为即曾指出，尽管当时外蒙危机确实应该严肃以对，但是革命党人士对此一危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党人对少数民族地区领土问题的踌躇不定，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帝俄的野心，使其胆敢觊觎中国的北疆。换言之，在中国少数民族边疆问题上，康有为认为革命党人居心叵测。一方面，他们尽可能保全前清版图；另一方面，这些革命党人士亦不惜在最后时刻，牺牲边疆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地区领土，以换取外国势力对其新民国政权的支持。正如康有为所说，武昌首义后，湖北

^① 戴季陶：《川边边防问题》，《戴季陶集》，第412~414页。

^② 见《民元藏事电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武汉的军政府以“十八星旗”作为国旗，乃是情理之中的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十八星旗表示革命党人士真正关注的，是传统的中国内地十八行省，满、蒙、疆、藏等边远地区，在他看来，则不在革命党人的主要考虑之列。^①

事实上，武昌首义后，革命党人对于如何界定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确实犹疑未定。革命爆发当日，刚刚成立的武汉军政府颁布法令，将“革命事业”定义为“以汉反满，谋取独立”。两天后，革命党人致电北京，勒令满人在关外“削号归藩，称臣纳币”。在这份电报中，国民党人直言不讳地要求满人臣服于汉人，结束在中国的统治，但对于新政府与蒙、回、藏各族的关系，却从未进行明确的阐述与厘清。^②

若从一个全新的历史视角来审视，我们不难发现，国民党人的少数民族政策，极具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然而，回顾过去，似乎也正是此种模糊和不确定性，让民初时期的国民党，可以加以战略性的操作利用，在拟定相关政策时，趋利避害，从而在最大限度上，谋求自身的政治与外交利益。武昌起义后一个月左右，革命党人与袁世凯进行谈判，商议和平移交政权。直至此时，革命党人才真正严肃审慎地思考该如何定位少数民族问题。1911年11月6日，南北议和仍在进行之中，南方革命党人汪精卫和北方立宪派代表杨度，联手在北京组建“国事共济会”。该会成立宣言中提到，南北双方都应努力推进人权，“满、汉、蒙、回、藏五族，必使同立一政府之下，不使分离”。^③为了维持前清既有之版图疆域，避免新的民国政府陷入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殆尽”的境地，南北双方进一步达成共识，全力保护满、藏、蒙、回各族的既得利益。^④由此可

① 康有为：《蒙藏哀词》，民国经世文社辑《民国经世文编》第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再版，第2235页。

② 张难先：《都督府之组织设施及人选》，曹亚伯：《武昌起义》，均见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208、151～153页。

③ 高秉和：《北京政府成立》，《辛亥革命》第8卷，第541～543页。

④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第399～402页；观渡庐编《南北议和史料》，《辛亥革命》第8卷，第69～102页。

见，汉人不仅要用革命推翻满族统治、获取自身独立，还要努力实现民族融合，建立一个以汉族为中心的多民族国家。

南北和谈中，有一个特别值得吾人关注的细节，那就是革命党人在会谈中，主动提出清室退位后“尊号保留不变”、“保护皇室财产”等优厚清皇族人士的条件。此举的动机，无非是希望袁世凯方面，早日承认革命党人，以从清政府手中和平转移政权。另一方面，这些妥协看似有助于早日让清室退位，建立新共和，但实质上却也反映出革命党人士唯恐新政权成立后，迅速失去对各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影响力，更不想让中国就此陷于任人宰割的境地。^①也因此，当时尽管革命党阵营内部，反对礼遇优厚清室者不乏其人，但革命党人士最终还是提出如上条件。然而时过不久，到了1912年春，当革命党人发觉大势已去，袁世凯终将以实力取得对民国新政府的掌控时，其态度又有了极大转变。为了争取更多中国内部民心的支持，他们在少数民族边疆问题上，表现得寸步不让。如前所述，为了顺应舆情，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一批国民党精英分子，早年都曾倡导在边疆地区实行以汉族为首的“民族同化”和“移民实边”。而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之后，为了削弱袁的政治正当性，他们更不遗余力地将蒙藏分裂势力的抬头，归咎于北京政府无视两族人民的举措，并严词批评当局在抵制帝国主义分裂势力时的软弱无能。^②

三 国民党隐晦的民族政治

根据近年来出版的史料汇编，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边疆民族政策上，是怀有务实和机会主义倾向的。自1910年代中期以来，

① 许师慎编《国父当选临时大总统实录》第2卷，台北，“国史丛论社”，1967，第201~259页；溥伟：《让国御前回忆日记》，甘蔘：《辛亥革命之秘史》，均见《辛亥革命》第8卷，第110~115、116~119页。

② Marie-Claire Bergère, *Sun Yat-s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69-276; 金冲及：《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第288~320页。

他所努力的，与其说是致力于维护前清遗留的传统帝国版图，不如说是利用革命党人士未曾真正有机会治理的“虚拟”与“想象”的中国边疆领土版图，寻求外国势力的援助，以推进自己在南方中国地区的革命事业。1917年6月，北京国会因府院之争被迫解散，孙中山趁机南下活动。同年9月初，他在旧国会议员的拥护下，在广州当选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在此期间，孙中山为了谋求日本援助，曾私下表示愿以满洲权益换取日本对其财政与军事上的支持。^①1918年11月，他在会见日本知名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时，进一步允诺，如果日本愿意支持南方革命党人，并拥护他成为中国最高领导者，他将承认日本对于满洲和东蒙地区的“领有”。^②

民国初年的民族与边疆政治蕴含着诸多困难与危机，只要国民党人未能执政，未能掌握国家与中央政权机器，他们便没有机会处理这些边疆与外交问题。然而，从另一角度观之，正是这样的在野身份，让国民党领导人物可以有更多周旋与模糊空间，通过边疆问题的操作，以达成其政治目的。只不过讽刺的是，被国民党人严词批评指责的北京政府，此刻却从未放弃维系传统中国边疆权益的努力，此点充分展现在1913～1914年间的印度西姆拉会议上。在此次会谈里，英国企图瓜分西藏，提出“内藏”与“外藏”分而治之，“内藏”包括川西、康东和青海大部，“外藏”则包括康西与西藏，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藏自治”，并承诺不干涉“外藏”事务。^③当时中方谈判代表陈贻范迫于压力，草签此约以示妥协。但是，这份草约最后并未得到袁世凯中央政府的批准。北京当局不仅拒绝了该条约，并命令中国代表立即退出谈判。对

① 陈旭麓、郝盛潮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228页。

② 陈旭麓、郝盛潮编《孙中山集外集》，第236页；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第1133页；杨天石：《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73～289页；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

③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pp. 1-21.

于成立不久的袁世凯政权而言，英帝国的外交支持，无疑至关重要，但是权衡之下，袁世凯还是决定不予妥协。据戈尔斯坦的研究，北京政府原打算接受西姆拉条约，只是不愿放弃对昌都等藏东重要战略地区的控制权。^①另有观点认为，北京政府作出上述强硬决定，其实纯属无奈，主要是迫于当时国内舆情和国会里国民党反对派的压力；而当时四川地区的民情反应亦极为激烈，咸认为西康应属四川省版图，故极力反对袁世凯任何欲将其分离出去的举措。^②

不论袁世凯否决条约并下令中断谈判的真正原因为何，北京政府确实公开声明，英、藏之间单独缔结任何相关条约，均属无效，北京方面将不予承认。也就是说，北京方面认为西藏的政治地位，并未达成一明确结论，中方仍可就此问题保留进一步谈判的权利。尽管当时中国的政治与军事实力无法与英国匹配，但只要北京中央政府坚持这一立场，其对西藏的主权在法理上仍然有效。

中国北疆外蒙地区的情况发展，则与西藏有所不同。1912年11月，俄国和外蒙单独签署《俄蒙协约》，北京政府则以外蒙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无权对外签署条约为由，拒绝承认这一条约。袁世凯提出，如俄国撤约，北京政府愿与俄国直接交涉外蒙问题。俄国妄图通过谈判让中方承认外蒙独立，遂答应中方的提议。^③1913年11月，经过一年的艰苦谈判，双方签订《中俄声明》，俄国承认中华民国对外蒙的“宗主权”。次年秋天，中、俄、外蒙三方在恰克图举行会谈，此次会议再度重申《中俄声明》的内容，并进一步厘清所谓的“宗主权”究竟为何物：俄方同意北京政府有权在库伦任命高级官员，同意中国在蒙古境内驻扎一定

①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pp. 74–75.

② Hsiao-ting Lin,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1949*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6), pp. 52–53.

③ 张启雄：《外蒙古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第154～155页。